

# 城市景观书写与地方文脉构建——以宋代“成都书写”为中心

米昊阳

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四川成都

**【摘要】**宋代文人的成都书写，主要集中于武侯祠、杜甫草堂、浣花游江、成都府西园的游赏燕集。文人通过对成都城市建筑、公共空间和文化活动的书写，表达了对城市文化名人的尊崇和追慕，对地方文化的适应和认同，对城市生活的记忆和依恋。宋代文人的成都书写，对城市文脉的传承与延续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宋代；成都；城市书写

**【收稿日期】**2025年1月17日

**【出刊日期】**2025年2月27日

**【DOI】**10.12208/j.ssr.20250063

## Urban landscape writing and local context construction

### —Centered by "Chengdu writing" in the Song Dynasty

Haoyang Mi

Research Center for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The writing of Chengdu by literati in the Song Dynasty mainly focuses on the Wuhou Temple, Du Fu Thatched Cottage, Huanhua River Tour, and the West Garden of Chengdu. Through the writing of Chengdu's urban architecture, public space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literati expressed their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urban cultural celebrities, their adapt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local culture, and their memory and attachment to urban life. The Chengdu writing of literati in the Song Dynas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urban context.

**【Keywords】** Song Dynasty; Chengdu; Urban writing

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成都是巴蜀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辐射地。目前学界对于成都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唐宋和清朝，这也是成都城市发展史的鼎盛时期。相关研究集中于史实的考辨，或研究成都城市布局、建筑位置；或关注文化家族、蜀学发展；或论述城市绿化、植物花卉等。在过往的研究中，相关文学书写常常被用来以文证史，但是这些充满感情的作品背后蕴藏了文人怎样的情感呢？宋代文人对成都的城市印象究竟如何？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话题，本文试从此角度，揭示宋代文人成都书写所反映的文人心理和情感。

#### 1 文化名人的追慕：武侯祠与杜甫草堂的景观书写

两宋时期，朝廷和地方政府对武侯祠和杜甫草堂是极为重视的，新任地方官到了成都，一般都要拜谒这两处重要的名人遗迹。宋代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经历几次重修，其间文人也留下大量书写，下文试分析之。

##### 1.1 正统和忠义：武侯祠的文化精神

作者简介：米昊阳，文学博士，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专任教师。

自杜甫《蜀相》诗以来，武侯祠古柏就是文人最为关注的文学景观。宋代文人的武侯祠书写，也最为关注祠内古柏。与晚唐文人书写武侯祠古柏相比，宋初文人的书写特征是逐步神化。先是著名文人田况在《儒林公议》一书提到成都武侯祠前有一棵大柏树颇有神异：

成都刘备庙侧，有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围数丈。唐相段文昌有诗，石刻在焉。唐末渐枯，历王建、孟知祥二伪国，不复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967)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时人异焉<sup>[1]</sup>。

在前蜀、后蜀割据时期，此树甚至拒不发叶，好像在表达对割据政权的不满。待宋朝一统巴蜀，它又枯柯再生，新枝耸云。因为此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植，故获得了人们的崇拜。这不仅给它注入了丰厚的文化内涵，还注入了儒家正统的文化精神。田况还作有《古柏

记》纪其事：

成都诸葛孔明祠古柏，年祀寔远，乔柯钜围，蟠固凌拔，有足异者。杜甫尝作歌，段文昌亦作文，摹状环奇，人多谕诵。故老相传及记事者云：“自唐季凋瘵，历王、孟二伪国，蠹槁尤甚。然以祠中树，无敢剪伐者。皇朝乾德丁卯岁仲夏，枯柯复生，日益敷茂，观者叹耸，以谓荣枯之变，应时治乱。武侯光灵，如有意于兹者，诚为异哉！因命工图写，备述本末，以贻好事者。自三分讫今，八百余龄矣<sup>[2]</sup>。”

十余年后，陈荐在《武侯祠》诗中说：“手植劲柏尚苍翠，疑有神灵潜护持。”<sup>[3]</sup>开始进一步神化。裴士禹《蜀先主庙古柏》亦云：“陵前古柏树，千丈起平地。根大压巨鳌，心虚藏野隧。风动虬龙枝，雷雨随声至。疑是虚空间，神明专护庇。不尔千万年，突兀无枯瘁？”<sup>[4]</sup>在文人的书写过程中，古柏的形象已越传越玄。这表明，当时文人们在按儒家正统的文化观念，从不同角度、不同途径、不同侧面，不断丰富着武侯祠的各种文化内涵。

南宋后伴随着两次重修，文人书写武侯祠渐渐转向所承载的诸葛亮雄才伟略、鞠躬尽瘁的精神。南宋初年武侯祠经过两次重修，一次是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至十四年（1144）间张焘组织，喻汝砺《杜工部草堂记》有载。另一次是绍兴二十九年（1159）王刚中组织<sup>[5]</sup>，任渊有记。这次武侯祠重建工程完成后，任渊面对宏丽壮观的新祠宇，不禁发出思古之幽情与感叹：“智力之不胜义也久矣。”他在记文中追述了蜀汉王朝的建立、兴盛过程，突出对刘备复汉兴汉志向的赞颂，对诸葛亮的雄才伟略、鞠躬尽瘁的歌咏：

东汉之季，王室陵夷。曹氏怙奸贼之资，以擅中原；孙氏席强大之势，以并江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志于王室也。……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胄之英，负非常之略，崎岖奔走，经理四方，最后伐刘璋，遂有蜀汉。

当是时，丞相忠武诸葛侯实左右之，人品意象，高远英特，駸駸乎伊、吕之间。应变机权，本于道德。内修综核之政，外举节制之师。欲以攘除奸凶，混一区宇，不负其君付托之意，可谓社稷臣矣！<sup>[6]</sup>

由此足见任渊对刘备、诸葛亮君臣品格的赞美，在武侯祠残破已久的情况下，任渊的记文、王刚中的主持重修，无疑是对蜀汉文化和诸葛亮精神的一次重塑和修复，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任渊此文也指出王刚中重修武侯祠的现实考量，即稳定蜀地秩序，树立正统精神，教化民众，使“威德流闻，民夷宁谧，视忠武不愧”。而不仅仅是“钦崇秩祀为牧守之所当先也”。<sup>[7]</sup>

南宋文人的诗歌创作也体现出对蜀汉文化和诸葛亮精神的推崇。与任渊同时代的文人孙应时有诗《又谒武侯祠》：“城南风景故堪怜，胜日经行意洒然。江上竹寒偏却暑，庙前柏老尚参天。堂堂不朽能千古，鼎鼎何能漫百年。醉里狂歌心浩荡，为君一吸倒觥船。”<sup>[8]</sup>此诗指出诸葛亮的忠义精神千古不朽。南宋淳熙初，武侯祠迎来了伟大诗人陆游。陆游当时在成都范成大幕府为官，他拜谒祠宇，见举目荒凉，伤感不已，做诗《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云：

雨止风益豪，雪作云不动。  
凄凉汉陵庙，衰草卧翁仲。  
画妓空笙竽，土马阙羈鞚。  
壤沃黄犊耕，柏密幽鸟啼。  
尚想忠武公，身任社稷重。  
整整渭上营，气已无岐雍。  
少须天意定，破贼宁患众。  
兴亡信有数，星陨事可痛。  
陵边四五家，茆竹居接栋。  
手皴纸上箔，醅熟酒鸣瓮。  
虽嗟生理微，亦足道饥冻。  
刘葛固雄杰，阅世均一梦。  
论高常近迂，才大本难用。  
九原不可作，再拜临风恸。<sup>[9]</sup>

钱仲联先生认为，此诗于淳熙四年（1177）十月作于成都。陆游十分崇拜武侯诸葛亮，认为是自己心目中理想英雄。在成都时便多次作诗，以其精神勉励自己，其《暮归马上作》云：“宝马俊游春浩荡，江楼豪饮夜淋漓。醉来剩欲吟梁父，千古隆中可以期。”<sup>[10]</sup>《城东马上行》则表达了图谋恢复的壮志：“摩挲病眼还三叹，犹拟中原看太平。”<sup>[11]</sup>《病起抒怀》则再次表达了自己定要完成恢复的决心：“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sup>[12]</sup>《咏史》则云：“英雄自古常如此，君看隆中梁甫吟。”<sup>[13]</sup>诗人抒怀之余，还是希望自己也能上阵

报国，如《夜读兵书》云：“万乘久巡狩，两京尽丘墟。此责在臣子，忧愧何时虑？南郑筑坛场，隆中顾草庐。邂逅未可知，旄头方扫除。”<sup>[14]</sup>《读史有感》则深切抒发了愿为恢复大业献身的情怀：“隆中高卧人千载，易水悲歌泪数行。”<sup>[15]</sup>由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诸葛亮在陆游心里象征着图谋报效、恢复中原的理想，故诗人见祠庙残败，心中不免悲凉、感喟。

### 1.2 忠信和孝悌：杜甫草堂的诗圣意义

入宋以来，草堂遗址仍然存在，这在当时文人诗文中多有记载。如成书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乐史《太平寰宇记》便记载了杜甫宅仍在西郊外<sup>[16]</sup>。任弁《梁益记》则记载了天禧四年（1020）时草堂遗址的布局：“公之别馆，馆后为崔宁宅，舍为寺，今尚存焉。”<sup>[17]</sup>仁宗年间，葛琳曾游浣花溪之浣花亭，见杜甫草堂、任氏之祠犹在，其《和浣花亭》诗云：“杜宅崩遗址，任祠载经祀。”<sup>[18]</sup>赵抃《题子美书室》则首次提到草堂遗址有杜甫画像：“茅屋一间遗像在，有谁于世是知音。”<sup>[19]</sup>由此可见，宋初草堂虽有修葺，但是规模甚小，仍然是茅屋形态，没有得到广泛关注，这与北宋初年杜甫在文坛地位仍然不高有关系。

在北宋前期，杜甫其人其诗并不为诗界所重，在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如西昆派代表人物之一杨大年就比较轻视杜甫，刘放《中山诗话》有载：“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sup>[20]</sup>随着北宋儒学进一步发展，在士人眼里杜甫的品格越发彰显。特别是苏轼以“一饭不忘君”一言定义杜甫儒家代言人地位，他在《王定国诗集序》一文里表示：“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sup>[21]</sup>苏辙《诗病五事》也附和其兄的观点：“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不知义理之所在也，唐诗人杜甫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sup>[22]</sup>鉴于苏轼在文坛具有崇高的地位，他的观点就成为了文坛核心认识。其后黄庭坚则将杜甫其人其诗推上神坛，“自王安石、苏轼对杜诗的推崇和重新阐释之后，杜甫的地位虽已日益不可动摇，但真正将杜甫推尊到宋诗宗祖的神坛的，却是黄庭坚及其所开创的江西诗派。”<sup>[23]</sup>特别是黄庭坚曾贬谪蜀中，对蜀地的诗文、士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在蜀中作了很多扩大杜甫影响力的工作，不仅刻版印刷杜诗，还在大雅堂竣工时作了序文。他还作有《老杜浣花溪图引》一诗，此诗如下：

拾遗流落锦官城，故人作尹眼为青。  
碧鸡坊西结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纓。  
故衣未补新衣绽，蟠胸中书万卷。  
探道欲度羲皇前，论诗未觉国风远。  
干戈峥嵘暗宇县，杜陵韦曲无鸡犬。  
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飘零不相见。  
此公乐易真可人，园翁溪友肯卜邻。  
邻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鱼鸟来相亲。  
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  
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  
愿闻解鞍脱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  
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  
生绡铺墙粉墨落，平生忠义今寂寞。  
儿呼不苏驴失脚，犹恐醒来有新作。  
常使诗人拜画图，煎胶续弦千古无。<sup>[24]</sup>

黄庭坚虽然没有到过成都草堂，但是他极为推崇老杜，尤其是其忠义精神，所谓“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生绡铺墙粉墨落，平生忠义今寂寞”。经过众多北宋著名文人的推崇，不仅使杜甫的形象被抬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作品也广受人们赞赏和推崇。鉴于黄庭坚的影响力和贡献，所以后来文坛尊崇他，把他置于杜甫之下配享祭祀。

元丰五年（1082）时，吕大防出任成都知府，任上他做了两件重大的工作，一是注释杜诗，一是重建草堂。据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吕大防在重建草堂时还新绘制了杜甫画像。“丞相吕公镇成都，复作草堂於先生之旧址，绘先生之像于其上。”<sup>[25]</sup>元祐初，胡宗愈知成都府，刻杜诗于草堂。“宗俞假符於此，乃录先生诗，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间。”<sup>[26]</sup>他的理由是：“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其所游历，好事者随处刻其诗于石。及至成都，则阙然。”<sup>[27]</sup>从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中我们可以看出，自吕大防重建草堂开始，修葺草堂就不再仅仅是民间的自发行为，而成为地方官员的一种重要施政举措。这种转化也标志着杜甫突破了唐代以来单纯的诗人身份，成为地方施政和教化中儒家人格的范型。从此杜甫不再仅仅是一名诗人，而是具备了文化符号的意义，即宋人所尊的“诗圣”。

南宋时文人书写草堂的主要代表是赵次公、喻汝砺的两篇记文，也是目前关于草堂可见最早的记文，都作于绍兴九年（1139）张焘知成都重修草堂时。赵次公

《杜工部草堂记》表达了他对杜甫的尊崇和向往：“我公以甫气味之同，神交于今日。”并认为汉魏六朝至唐初诗之旨不传，直至杜甫出现于诗坛，才重拾诗之本旨，即明教化。“惟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切写之以诗。”赵次公甚至认为杜诗出处，“每与孔孟合”。在记文的结尾，赵次公称赞了张焘重修草堂意义深远：“天下后世，由是识曲阜之履。爱甘棠之木，诵其诗以知教化之原，岂不自我公发之邪？”<sup>[28]</sup>赵次公是南宋注杜诗的名家，著有《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在杜诗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对草堂的书写和对杜甫精神的尊崇，更为草堂打上了深厚的文化烙印。

与他同时所作的还有喻汝砺的《杜工部又记》一文，喻汝砺在文中不仅感慨了少陵之诗“根于忠信孝弟，著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还对他的上司张焘表达了深切的赞许。他指出张焘重建草堂不仅仅是眷于杜甫之诗，还因为欲学杜甫匡天下之志，重光中兴之业：“今公治蜀，其所以忧恤斯民之心，见于措置如此，此其所以眷眷于少陵之诗乎？故曰：‘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诚公之志也欤！”<sup>[29]</sup>南宋时蜀地官员重建成都草堂，在当时有着特殊的时代心理，我们可以说士人们在国家半壁沦亡时，又重新发现了杜甫，其身上的忠贞品质，也愈加放大。

有宋一代虽然地方官重视草堂的修缮工作，但是日常管理却极为不善，常因无人管理而荒废，这一点在宋人诗文中多有较多反映。如宋京《草堂》一诗所说：“君不见少陵草堂背西郭，浣花溪水流堂脚。竹寒沙白自凄凉，莫问四松霜草薄。入门好在乌皮几，公去不归换邻里。西岭千秋雪书消，舍北泥融飞燕子。只今桤木平桥路，笼竹和烟杂江雾。野僧作屋号草堂，不是柴门旧时处。诗坛今古谁能将，艳艳文章光万丈。安得英才擅品量，当使公居摩诃上。”<sup>[30]</sup>作者感慨杜甫之诗光芒夺目，但是所居草堂却随着时代而变迁而日渐荒芜。又如李流谦《草堂》云：“浣花溪上得闲来，石刻摩挲病眼开。短策多时临水立，红尘半路与风回。乞灵仗薄裳为带，惊世名言海纳杯。相对只今真梦寐，数椽茅屋老苍苔。”<sup>[31]</sup>亦可见当时的草堂疏于管理，比较荒凉。马辅《过子美草堂》诗云：“栖迟九月锦水行，独过草堂西出城。村树冉冉秋照白，水花漪漪江水平。溪边三重结茅屋，松萝翳疏晚雨清。往来沽酒且有客，胡为奔走不自停。”<sup>[32]</sup>亦写出草堂松萝凋敝、晚雨萧条的寥落景象。

总之，宋代文人对武侯祠与杜甫草堂的书写，主要还是根植于儒家正统观念。武侯祠与杜甫草堂，严格来

讲都属于名人祠宇，本身就承载了丰厚的儒家精神内涵：忠孝礼义。一定程度上，这种精神内涵是宋人所发掘并宣扬的，从而不断感召后人前来拜谒，反复书写，为我们留下了宏伟壮观的文化景观和意蕴深厚的精神财富。

## 2 地方认同的构建：官民同乐的浣花游江图景

浣花溪位于成都西郊，中唐以来，“浣花游江”始盛。及至宋代，在地方官的推动下，游江成为成为盛大的地方节日。以浣花游江为代表的城市公共生活空间，也开创了士大夫与市民不同政治地位和社会阶层的交织、重叠。浣花溪一方面是城市的市民游赏行乐的胜地，代表着大众的娱乐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大员借此宣示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场所。

### 2.1 浣花遨头：全民参与的仪式庆典

得益于当时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唐宋时代成都游乐之风颇盛，对此唐人《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形容道：“雁桥风暖，犀浦花新。迭嶂萦郭，长杨映津。轩车照地，士女惊姝，风土堪乐，山川可珍。”<sup>[33]</sup>良好的水域环境为浣花游江活动提供了卓越的场所，中唐时便有地方长官便在此游江行乐：“暮春上巳，与宾客将校数百人具舟辑游于江，都人纵观如堵……。”<sup>[34]</sup>五代之时，前后蜀的统治者喜好游乐，浣花游江更加兴盛。宋人耿焕《野人闲话》如此形容：“每春三月，夏四月，有游花院者，游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填咽，贵人公子，华轩彩舫游百花潭，穷极奢丽。诸王功臣以下，皆置林亭，异果名花，小类神仙之境。”<sup>[35]</sup>可见五代时的浣花游江活动不仅官僚显贵亲力而为，城市的普通士庶也参与其中。据宋代西蜀士人张唐英《蜀棹机》的记载，前蜀王衍乾德五年“四月，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sup>[36]</sup>后蜀孟昶游江的规模则更为壮观，“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是时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昶御龙舟，观水嬉，上下十里，望之如神仙之境。”<sup>[37]</sup>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亦载：“帝游浣花溪，御龙舟，观水嬉，帝谓左右曰：‘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sup>[38]</sup>及至北宋，浣花游江成为了全城最隆重盛大的活动。“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则倾城皆往，里巷阗然。”<sup>[39]</sup>可见唐五代时，浣花溪游江活动规模宏大，已经是地方文化的重要内容。

北宋初平蜀地时，并未能建立起有效统治，局势动荡不已。几任太守皆归之于蜀风淫佚、蜀民易动，因而实行严厉的政策，引起蜀民的反抗。张咏入蜀后经过一

番考察，一改前任官员们被动应对蜀地民情的策略和简单粗暴的施政方式，主动去适应蜀地的社会状态和风俗习惯。他认为，蜀地富庶以致民风轻浮游乐无节制，是导致当地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元素之一。但是为政者如果粗暴的对当地传统横加干涉，只会适得其反。为官一方，就要深入当地社会，主动融入民间了解民情，这是在当地顺利执政的基础。但是官员也有引导一方风俗的责任，有必要对不正之风加以纠正，从而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良俗，如此方可消除对立，稳固统治秩序。因此张咏提出民间游乐需要加以引导，使其有所节制。正所谓“昔贤孜孜戒骄荡，猖狂不是风流样”。“但使家肥存礼让，岁岁春光好游赏。”<sup>[40]</sup>

我们可以看出，同前任相比，张咏最大的不同在于愿意尊重蜀地文化，顺应蜀地民情。基于对社会民情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张咏积极引导蜀人的游乐风俗，对蜀地游乐活动进行了调整。如二月二日本为蜀地踏青节，但是踏青节时民众往往散在四郊，张咏之前的蜀地长官顾虑民众滋事，往往分兵四出以监视，兵民冲突当为数不少，民众也易生怨。张咏上任后，遂改踏青为游江，既满足了民众游乐的需求，又易于管理。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游蜀江》载：

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缙幕歌酒，散在四郊。历政郡守虑有强暴之虞，及分遣戍兵于冈阜坡冢之上，立马张旗望。之后乖崖公帅蜀，乃曰：“虑有他虞，不若聚之为乐。”乃于是日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名曰游江。于是都人士女，骈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创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倍于往岁，薄暮方回。<sup>[41]</sup>

元人费著《岁华纪丽谱》也有相似记载：“初郡人游赏，散在四郊。张公咏以为不若聚之为乐。”<sup>[42]</sup>根据上述文献，张咏所创立的二月二日游江，起万里桥以锦绣器皿至宝历寺桥，并且宴于寺内。值得注意的是，文献还提到张咏在寺前创建蚕市，便于民众交易、嬉游。

张咏还做出积极姿态，主动融入蜀地，在岁时节庆带头作彩舟游江，供士庶百姓沿江游赏，甚至与民同游。在张咏的带头推广下，宋代成都游江活动发展壮大，为一时盛观。韩琦如此称赞张咏功绩：“蜀风尚奢，好邀乐。公从其俗，凡一岁之内，游观之所与夫饮饌之品，

皆著为常法，后人谨而从则治，违之而人情不安。”<sup>[43]</sup>据此看来，张咏治蜀不仅成效显著，而且深得民心，蜀人对他感恩戴德，以致他去世后蜀人闻之伤心欲绝，并为之建庙祭祀。“于是蜀人恸哭罢市，置公画像于天庆观之仙游阁，建大斋会，事之如生，岁岁不绝。”<sup>[44]</sup>

张咏的所创立的游江活动和治蜀思想也为后来入蜀官员奉为准则并遵循，逐渐成为地方良俗。自张咏以后，北宋历代成都地方长官如田况、薛奎、韩绛、宋祁等人，治蜀大体都遵循他与民同乐的方针。如韩绛为了方便二月二日游江活动，还创建了乐俗亭。<sup>[45]</sup>田况在二月二日游江后，见“彩舵列城隈，画船满江隅，轻桡下奔濼，从舆临精庐”的盛况后不禁感慨：“因思贤守事，所作民乃孚。”<sup>[46]</sup>正如田况所说，张咏通过建构一道成都全体民众参与的仪式庆典，确立了施政的合法性和地方的统治秩序。游江活动也贯穿了整个宋代，形成了一道靓丽的城市风景。

张咏所制定及带头实施的成都岁时节庆的游乐活动，史籍称为“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即是太守作为邀头，在四月十九日浣花溪大游江中带头游乐，称为“浣花邀头”。苏轼在其诗《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的自注中说：“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谓之邀头。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sup>[47]</sup>陆游所著《老学庵笔记》卷八也记载：“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邀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sup>[48]</sup>四月十九日浣花溪大游江时，官府组织军士水嬉竞渡。是时各船彩旗招展，两岸观者如云，至晚方歇。

浣花大游江的盛况，先后有北宋田况、南宋任正一的两篇记文记载。田况蜀中曾作《成都邀乐诗》二十一章记成都之游乐风俗，其中《二月二日游江会宝历寺》、《四月十九日泛浣花溪》书写了游江风俗景观。田况还写下了《浣花亭记》，其中重点描写了其参与浣花大游江的盛况：

自岁旦涉孟夏，农工未盛作时，观者填溢郊郭。过浣花之游，则各就其业。太守虽出，游观者希矣。故浣花一出，在岁中为最盛。彩舟方百尾，沂涵久之而下，歌吹振作。夹岸游人，肩摩足累，绵十里余。临流竞张饮次，朋侣歌呼，或迎舟舞跃献伎。曠夜，老幼相扶，挈醉以归，其乐不可胜言已。信乎！皇仁溥远浸渗，蒙幸太平之效致然欤！<sup>[49]</sup>

任正一《游浣花记》则记载了浣花游江的路线和沿途造访的景点：

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而浣花为特甚。每岁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丽服靓装，南出锦官门；稍折而东，行十里入梵安寺，罗拜冀国夫人祠下；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与其目。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块、如带、如规，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沈瓜，窈然深碧、滢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为青羊宫，溪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平望如荠，水木清华，神肤洞达。自宫以西，流汇而桥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灌县，或所云“江从灌口来”是也。<sup>[50]</sup>

按照任正一所记，游江活动内容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祭拜冀国夫人和杜甫。其次是在太守的带领下游江。游江活动从成都锦官门开始的。宋代成都城池分为子城和罗城，罗城的西南边有门名笮桥门，又名锦江门。笮桥门门外即锦江，上有名笮桥者，向东南方顺流而下不远即是万里桥。出笮桥门陆行“十里”至浣花溪畔，首先入梵安寺冀国夫人祠祭拜，次游杜甫草堂，然后在梵安寺设厅宴饮。祭拜完成后，太守与其僚属以及能准备彩舟的百姓，乘坐彩舫从浣花溪登船顺流而下。在宋代冀国夫人被认为是成都的保护神，受到市民的尊崇和祭祀。何耕有《龙华大像盖冀国夫人所作因成二绝》其二云：“生男个个欲如狼，妇女军中气不扬。试问争功嗔目士，几人能敌浣花娘。”<sup>[51]</sup>作者游浣花溪目睹游江的盛大场面有感而发，于是写了这首诗歌，表达了对冀国夫人的尊崇。任正一《游浣花记》接着写到：“凡为是游者，架舟如屋，饰以绘彩，连樯衔尾，荡漾波间。”<sup>[52]</sup>庄绰《鸡肋编》卷上亦载其事：“浣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皆民家绞络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赏以金帛。”<sup>[53]</sup>可见太守与众人游江是歌吹相随，妓乐相伴，一路表演直到百花潭，然后观水嬉竞渡。

太守不仅充当邀头，在游江期间还会给民众分酒。赵抃《成都古今集记》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给游人，随所会之数以为斗升之节。”<sup>[54]</sup>庄绰《鸡肋编》更有详细记载太守分游人酒是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以大舰载公库酒，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人支一升。自暮遵陆而归。”<sup>[55]</sup>由此看来，在当时蜀地长官眼里与民同游既是一场全民狂欢，也是一项重要的政务，代表

着地方长官对当地民风民情的顺应态度。

## 2.2 满城欢醉：入蜀文人的城市生活和文化记忆

浣花游江作为一场盛事，激发了历代成都地方官员的诗兴。与唐代诗人的作品相比，这些诗歌内容上不再是单纯的描写景色和抒发感叹，而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来观察记录城市风情与民众生活。当时参与游江的文人所关注和表现的，主要是宏大的仪式场面。如田况《成都遨乐诗二十一首》其十六《四月十九日泛浣花溪》：

浣花溪上春风后，节物正宜行乐时。  
十里绮罗青盖密，万家歌吹绿杨垂。  
画船叠鼓临芳渚，綵阁凌波汎羽卮。  
霞景渐曛归棹促，满城欢醉待旌旗。<sup>[56]</sup>

继田况后，薛奎知成都府。薛奎喜好游宴闻名于当时，开封府任上时，时人称为“薛出游”，知成都府则自号“薛春游”。薛奎曾于成都作有《何处春游好》十一章纪遨游之事，其间当有浣花游江之书写，可惜此诗已佚。继薛奎后，宋祁也是一位关注并书写浣花溪游江的知府，《春日出浣花溪》一诗写道：

侧盖天长荡晓霏，暖风才满使君旗。  
水通江渚容鱼乐，草遍山梁报雉时。  
场雨灭尘盘马疾，楼云碍曲进觞迟。  
少陵宅畔吟声歇，柳碧梅青欲向谁。<sup>[57]</sup>

范镇则劝当时知成都的吴中复一定要感受浣花游江的气氛，纵使时节已过。《和成都吴仲庶见寄来韵》其一云：

岁华今缓昔如流，旧日樊笼可自由。  
官事了时无尽极，人生安处且闲休。  
愚忠皎皎丹心老，归思绵绵两鬓秋。  
纵使海棠时节过，急行须及浣花游。<sup>[58]</sup>

吕陶《浣花泛舟和韵》：

野店村桥迤邐通，蜀江深处茂林中。  
花潭远漾春波绿，綵阁相迎画舫红。  
修岸几朝经密雨，芳樽终日得清风。  
诗翁旧隐知何在，且事嬉游与俗同。<sup>[59]</sup>

到了南宋时期，蜀地长官参与浣花游江热情不减。曾任四川制置使的范成大便是如此，所作《浣花戏题争标者》便描绘了游江活动中争标的盛况：“凌波一剧便捐生，得失何曾较重轻。蜗角虚名人尚爱，锦标安得笑



渠争。”<sup>[60]</sup>

京镗在离蜀时也曾作《念奴娇》一词，意在向朝廷士人反映浣花游江的宏大场面和自己得以参与其中的兴奋心情。此词前有小注云：“某丐归得请，有旨候代者入境方许其去。适修浣花故事，成长短句，呈都运都大判院，伏冀一噓。”词曰：

绣天锦地，浣花溪风物，尤为奇绝。  
无限兰舟相荡漾，缛彩重重装结。  
冀国遗踪，杜陵陈迹，疑信俱休说。  
笙歌丛里，旌旗光映林樾。  
自笑与蜀缘多，沧浪亭下，饱看烟波阔。  
屡疏求归才请得，知我家山心切。  
已是行人，犹陪佳客，莫放回船发。  
来年今日，相思惟共明月。<sup>[61]</sup>

我们可以看到，春光明媚之时游乐宴饮，实在是一大乐事。浣花清旷的景色和盛大的游乐队伍助长了知府和随从官员们的游兴与酒兴，而他们的立场，基于这样的认识，位高权重的官员在人地关系上就必须主动的努力调试，他们不可能像下层文人那样以自我中心，这在他们的诗歌中有着明显的表达。大多数入蜀任职的地方大员，都能够很好的融入蜀地的社会生活。他们教化风俗，与民同乐，他们的诗歌也就展现出雅正的品格和闲适的心境。这些书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官员们都注意到草堂久未修缮，且不为当时人所注意，然而官员们也只暂且与民同乐，并未有过多的关照。

对于来蜀地为官的文人们来说，浣花游江亦是他们离开蜀地回到京城所怀念并沉浸其中、不能忘记的盛景。如宋祁《忆浣花泛舟》便感慨道：“早夏清和在，晴江沿溯时。岸风摇鼓吹，波日乱旌旗。醉帘牵细蔓，游鬢扑绛蕤。树来惊浦近，山失悟舟移。雅俗西南盛，归辎东北驰。此欢那复得，抛恨寄天涯。”初夏在泛舟，是何等逍遥之事。“醉帘牵细蔓，游鬢扑绛蕤。树来惊浦近，山失悟舟移。”<sup>[62]</sup>作者完全沉浸在游江欢乐之中，甚至忘记了船在行驶。可见太平盛世之时，游江的气氛是何等的热烈！苏洞也曾造访过浣花溪，《浣花溪》：“抱郭清溪一带流，浣花溪水水西头。重来杜老谁相识，沙上鳧雏水上鸥。”<sup>[63]</sup>

元代以后浣花游江逐渐衰亡。明代改游上巳，蜀定王有诗《上巳日浣溪泛舟》形容此景道：“喜逢被袂遇芳辰，日暖风和景物新。曲水当年留胜迹，浣花今日岂无人？盍簪玩赏临郊外，约友流杯近水滨。三月桃花春浪暖，坐看翠藻跃金鳞。”<sup>[64]</sup>可见景象还是颇清新怡人，

但已无两宋游江之宏大壮观。清代浣花溪水渐干涸，又改为人日游草堂，游江之盛景彻底成为历史记忆。

### 3 游赏与雅集：官署西园的诗意栖居

在成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园林为郡圃西园。其地在罗城西北，根据四川省文史研究会主编《成都城坊古迹考》一书的考证，大概在今正府街一带。<sup>[65]</sup>西园盛景主要有二：一是西楼登览远眺岷山，二是锦亭燃烛观海棠。宋代文人对此也着墨最多。

#### 3.1 “岷山秀”和“北枝愁”：西楼登览的盛景与文人心态变迁

西楼登览，景色由远及近，层次分明，尤以远眺岷山为胜。岷山是成都西部的雄伟山脉，历来为文人关注歌咏，这山景究竟如何壮观呢？遗憾的是，纵观书写西楼的文献未有记载，北宋张俞《望岷亭记》可为参考：

其望伊何？春云始波，昆柔闾蔼，涵蔚瀛海，火宇无阴，万木交蒸，重岩沓嶂，倚云峨冰，秋空凝辉，秀卓天骨，朝阳夕月，异态殊色，寒日惨烈，时见城阙（青城、天阙各岷之一山耳），三峰含光，隐射天末（昆有第一第二峰及大面，是为三峰），此望岷之大概也。<sup>[66]</sup>

岷山山势连绵巍峨，主峰常年积雪，光彩绚烂，是成都平原一大盛景，官署园林多以此作为构景的重要元素。南宋李石《转运司爽西楼记》有载：“成都官治多胜处，端倚此山向背。”<sup>[67]</sup>岷山山势连绵巍峨，主峰常年积雪，光彩绚烂，是成都平原一大盛景，官署园林多以此作为构景的重要元素。由于其海拔很高，与成都平原形成鲜明对比，风景自然十分壮阔。而且古代城市民居建筑普遍低矮，不可能超过官署，所以登上西楼，目接之景毫无遮拦，江山秀景尽收眼底。正如唐代杜甫《登楼》诗所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sup>[68]</sup>虽然当时杜甫心境是忧郁的，但此句依然是对眼前实景的绝佳描绘。

宋代文人书写成都西楼，尤为关注远眺岷山之景，因为此景在中原较罕见，故给予文人极大视觉冲击力。如赵抃《成都西楼》一诗写出了西楼看山雄伟和登临快意：“多暇朱栏倚望频，远云开即见峨岷。昔贤初尽经营力，今我独为优幸人。胜帘阁高帷掩雨，老台民乐只登春。争如蜀国西楼好，四序风光日日新。”<sup>[69]</sup>这首诗描写江山秀景、物阜民丰，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气象。吴中复则侧重描写西楼俯仰之景的层次分明，令人神清气爽的特点，《西园十咏·西楼》诗云：“清风破大暑，明月转高秋。朝暮岷山秀，东西锦水流。”<sup>[70]</sup>面对如此

美景，作者不由得感叹“宾朋逢好景，把酒为迟留”。北宋后期，蜀地诗人李新登上西楼，面对江山壮丽不禁感叹：“锦水背人朝暮去，雪山随我久长寒。”<sup>[71]</sup>南宋中期，范成大在雪夜登西楼，所写之景更为壮观，《十二月二十四日西楼观雪》云：“一夜珠帘不下钩，彻明随雪上西楼。瑶池万顷昆仑近，玉垒千峰滴博收。”<sup>[72]</sup>此诗写景意境胜于前人处在于，诗人不仅描写了眼前可见的玉垒、滴博等山峰，更想象了昆仑山之“瑶池万顷”的宏大虚景。一“近”一“收”，虚实相生，从而达到以象传境的效果，充分调动了欣赏者的想象力。

成都西楼的书写不仅有自然风景的呈现，也因登楼文人的心态变迁而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如果说北宋诗人的西楼书写反映了治虞情怀和太平气象，那么南宋诗人则更多的抒发了个人的忧郁情感。如范成大《西楼夜坐》一诗道出了诗人心中的凄苦：“岩桂无香秋遂晚，江鲈有约岁将寒。文书散乱嘲痴绝，灯火凄清语夜阑。”<sup>[73]</sup>《西楼秋晚》则表达了劳形于案牍之疲态：“残暑已随梁燕去，小春应为海棠来。客愁天远诗无托，吏案山横睡有媒。”<sup>[74]</sup>按照陆游所述，四川制置使的工作十分繁忙，《范待制诗集序》曰：“以是幕府率穹日夜力，理文书，应期会，而故时巨公大人，抑或不得少休。”<sup>[75]</sup>范成大如此勤于政事却心气消磨，其根源在于国仇未报，故土未复，登高望远则更加剧了诗人的这种心理。如上文所提之《十二月二十四日西楼观雪》在描写雪夜登楼美景后笔锋一转：“已报春回南亩润，从教寒勒北枝愁。”<sup>[76]</sup>通过“南亩润”和“北枝愁”的巧妙对仗，蕴含了北望中原的国愁。诗人登高所见山河波澜壮阔，然而朝廷却偏安半壁，如何不叫人感到心中郁结？另一位大诗人陆游登西楼诗也抒发郁闷和无奈，《宴西楼》云：“西楼遗迹尚豪雄，锦绣笙箫在半空。万里因循成久客，一年容易又秋风。”<sup>[77]</sup>陆游在蜀为官，满怀一腔热血，力图为国从戎，收复中原，建功立业。然而朝廷日益安于现状，北伐梦想越来越远，既不能上前线报效国家，又要劳心于公务琐事。西楼宴集虽然歌舞繁华，“烛光低映珠帘雨，酒晕徐添玉颊红”<sup>[78]</sup>，诗人登楼望远，怎能不感到怅然！

西楼登览因为独特的自然风景进入了诗人的审美视野，而诗人的书写也将其所见所感呈现在文本上。明代钟惺在《蜀中名胜记·序》一文说：“山水者，有待而名胜者也，曰事，曰诗，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sup>[79]</sup>因为有了诗人的活动与题咏，西楼之景得以长存于文本，纵使已无法登楼，仍能通过文学书写去想象当时的登览盛景，甚至是陶醉其中。

### 3.2 海棠胜绝：西园雅集的诗意书写和城市依恋

西园的也是宋代入蜀文人唱和的绝佳场所。根据张咏《重修益州公署记》和吴中复《西园十咏》的记载，西园种植了佳华美木，有清流翠荫，萧寥傲睨之适，可助文人酬唱风雅。宋代官员有着积极入世的情怀，他们既出入官场料理世俗事务，同时也向往山林之隐而自我封闭，驰骋江湖之思，体味人生哲理。作为官署园林西园的亭台草木，则给这看似矛盾的生活状态，营造了一个方便的空间，使官员们在其间的生活既富有世俗气息，又显得高雅清新，从而增加了他们在任职之所的生活乐趣。如蒋堂卸任成都知府回京时，便在西园宴乐，邀乐伎助兴，乐伎陈凤仪作词表达了自己的依恋之情：“蜀江春色浓如雾。拥双旌归去。海棠也似别君难，一点点、啼红雨。此去马蹄何处？沙堤新路。禁林赐宴赏花时，还忆着、西楼否？”<sup>[80]</sup>吴中复则十分享受西园雅集唱和的氛围，《流杯亭》诗云：“结客乘公暇，流觞逐浩歌。乱峰晴倒影，曲水宛回波。小海逢元巳，兰亭记永和。西州行乐事，应比晋贤多。”<sup>[81]</sup>

宋代成都西园雅集的主题主要是赏海棠，尤以在锦亭燃烛夜观海棠为胜。海棠是蜀地名花，沈立《海棠记序》说：“蜀花称美者，有海棠焉……足与牡丹抗衡，而可独步于西州”。<sup>[82]</sup>陆游《海棠》也说：“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压千气林”。蜀地海棠晚唐时开始进入诗人的视野，及至北宋，成都海棠之盛名声远播，逐步为不少大诗人和文人所歌咏。晏殊《海棠四首》回忆道：“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sup>[83]</sup>黄庭坚《送高士敦赴成都钤辖二首》赞叹之：“烧烛海棠夜，香衣药市秋。”<sup>[84]</sup>可见北宋时期，成都海棠就已相当有名，即使是那些并未到过此地的诗人，也对它的美交口称赞。以海棠为题有两次唱和颇为著名，分别是吴中复与范纯仁、范成大与陆游之间的唱和。

熙宁四年（1071），吴中复“作诗《江左谓海棠为川红》，范纯仁与之唱和。”<sup>[85]</sup>吴诗《江左谓海棠为川红》（《方輿胜览》作《赏尧夫学士西园海棠》）感叹海棠之美冠绝天下，却偏于西蜀少人识之：“却恨韶华偏蜀土，更无颜色似川红。子美诗才犹阁笔，至今寂寞锦城中。”<sup>[86]</sup>范纯仁和诗《和吴仲庶龙图西园海棠》则写雨后海棠引人入胜之处：“濯雨正疑宫锦烂，媚晴先夺晓霞红。芳菲剑外从来胜，欢赏天涯为尔同。却想乡关足尘土，只应能见画图中。”<sup>[87]</sup>他不仅赞赏西园海棠的美，也惋惜以后只能在画图中见，足证西园海棠之特别。范纯仁在蜀期间与吴中复多有诗文交往，也是一段文坛佳话，如《同成都尹吴仲庶运判韩持正会饮》《和



吴仲庶游碑楼大慈二寺》《以眉州绿荔枝寄吴仲庶有诗次韵》《和仲庶江渚避暑》《将出蜀次仲庶送行诗韵叙别》等。

最为著名则是范成大对西园的书写以及他与陆游以海棠为题的诗歌唱和。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陆游为参议官。在成都时,范成大常与陆游以诗文为交,传为文坛佳话。《宋史》载:“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sup>[88]</sup>黄升《花庵词选》说:“范致能为蜀帅,务观在幕府,主宾唱酬,短篇大章,人争传诵之。”<sup>[89]</sup>范成大对西园的书写,除了前文所引《十二月二十四日西楼观雪》、《西楼夜坐》、《西楼秋晚》外,《锦亭然烛观海棠》一诗还有对西园之景的“颁奖词”:“银烛光中万绮霞,醉红堆上缺蟾斜。从今胜绝西园夜,压尽锦官城里花。”<sup>[90]</sup>此诗极写夜晚游宴观海棠之享受,可谓字字珠玑,极大的引起人们对西园的想法与倾慕。范成大曾邀陆游至西园夜赏海棠,陆游《锦亭》诗云:

乐哉今从石湖公,大度不计聾承聾。  
夜宴新亭海棠底,红云倒吸玻璃钟。  
琵琶弦繁腰鼓急,盘凤舞衫香雾湿。  
春醪凸盏烛光摇,素月中天花影立。  
游人如云环玉帐,诗未落纸先传唱。  
此邦句律方一新,凤阁舍人今有样。<sup>[91]</sup>

范成大和陆游此次锦亭夜观海棠唱和的盛况广为传播,所谓“游人如云环玉帐,诗未落纸先传唱”。陆游《范待制诗集序》曰:“公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围扇,更相赠遗,盖自蜀置帅守以来未有也。”<sup>[92]</sup>其影响力甚至远播江南。南宋后期,东南文士刘宰在《书石湖诗卷后》便提及:“蜀之俗大抵好文,其后生往往知敬先达,先达之所是亦是之。范公以文鸣,其毫端之朱玉,纸山之云烟,蜀士大夫争读之。”<sup>[93]</sup>诗人刘克庄写作《海棠》组诗亦云:“范公蜀西曲,陆老剑南诗。”<sup>[94]</sup>可见当时文人心里,海棠已经与陆范的蜀中风雅紧密相联,成为一个文学掌故。

西园的景观也因范成大、陆游的不断回忆和书写而成为城市意象,蕴含了诗人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意识。范成大离蜀时曾作《题锦亭》表达自己的不舍:“手开花径锦成窠,浩荡春风载酒过。来岁游人应解笑,甘棠终少海棠多。”<sup>[95]</sup>陆游在送范成大东归时也作《新津小宴之明日欲游修觉寺以雨不果呈范舍人二首·其一》怀

念曾经的共同生活:“风雨长亭话别离,忍看清泪湿燕脂。酒光摇荡歌云暖,不似西楼夜宴时。”<sup>[96]</sup>对于诗人来说,西楼、锦亭不只是一个具体建筑,它承载了城市共同生活的记忆,从而成为诗人表达情感的寄托。如陆游东归之后,即通过描写西园的西楼、海棠来抒发对蜀中生活的回忆与眷恋,如《海棠》诗云:“尚想锦官城,花时乐事稠。金鞭过南市,红烛宴西楼。千林夸盛丽,一枝赏纤柔。狂吟恨未工,烂醉死即休。”<sup>[97]</sup>《暮春二首·其一》云:“难续西楼梦,空存北陌身。海棠应似旧,惆怅又成尘。”<sup>[98]</sup>正如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所说:“每一个人都会与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某一部分联系密切,对城市的印象必然沉浸于回忆中,意味深长。”<sup>[99]</sup>

#### 4 结语

宋代是成都城市经济发达、文化繁盛的高峰,吸引了大量蜀籍和入蜀文人前来游历居住。纵观宋代文人的成都书写,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名人祠宇的景观书写,寄托了文人的历史正统观念和修身齐家、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二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书写,集中表现为对浣花游江的民俗展示,表现出对成都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的享受,对城市文化,尤其是游乐文化的认同。三是对园林游赏雅集活动的书写,集中表现为成都府西园的文人燕集的歌咏,表现出文人在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宋代文人的成都书写,不仅展示了自身与所生活城市的密切联系,亦通过对城市建筑、公共空间的描写,表达出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和依恋,使得成都的城市文脉得到不断的传承和延续。

#### 参考文献

- [1] 田况撰,张其凡点校:《儒林公议》,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5页。
- [2] 田况《古柏记》,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78页。
- [3] 陈荐《武侯祠》,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7页。
- [4] 裴士禹《蜀先主庙古柏》,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6页。
- [5] 《宋史·高宗八》载:“庚辰,以中书舍人王刚中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庚辰即绍兴三十年(1160年)。《宋史》卷三八六《王刚中传》又说王刚中到成都后即“葺诸葛武侯祠、张文定公庙,夷黄巢墓,表贤瘞恶以示民。”两文在具体时间上,有一年出入。参见脱脱:《宋史》,中华书局

- 1977年版,第590页,第11863页.
- [6] 任渊《重修先主庙记》,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83页.
- [7] 任渊《重修先主庙记》,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83页.
- [8] 孙应时《又谒武侯祠》,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5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88页.
- [9]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页.
- [10]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页.
- [11]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35页.
- [12]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78页.
- [13]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0页.
- [14]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6页.
- [15]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3页.
- [16] 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70页.
- [17] 任弁《梁益记》,王文才:《蜀志类钞》,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129页.
- [18] 葛琳《和浣花亭》,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4页.
- [19] 赵抃《题子美书室》,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6页.
- [20] 刘放著:《中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页.
- [21]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88页.
- [22] 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2页.
- [23] 杨经华:《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 [24] 黄庭坚著,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41页.
- [25] 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杜甫著,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册,第6588页.
- [26] 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杜甫著,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册,第6588页.
- [27] 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杜甫著,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册,第6588页.
- [28] 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08页.
- [29] 喻汝砺《杜工部又记》,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09页.
- [30] 宋京《草堂》,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9页.
- [31] 李流谦《草堂》,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38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46页.
- [32] 马辅《过子美草堂》,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0页.
- [33] 《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衷以勋纂修,杨芳燦续修,李勇先点校:《嘉庆成都县志》,《成都旧志》,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 [34] 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00页.
- [35] 耿焕撰,陈尚君辑校:《野人闲话》,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10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页.
- [36] 张唐英撰,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棹校笺》,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181页.
- [37] 张唐英撰,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棹校笺》,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375页.
- [38] 吴任臣撰:《十国春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38页.
- [39] 费著:《岁华纪丽谱》,《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页.
- [40] 张咏《二月二日游宝历寺马上作》:“春游千万家,美女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尽似乘烟霞.我身岂比浮游辈,蜀地重来治凋瘵.见人非理即伤嗟,见人欢乐生慈

- 爱.花间歌管媚春阳,花外行人欲断肠.更觉花心妒兰麝,风来绕郭闻轻香.昔贤孜孜戒骄荡,猖狂不是风流样.但使家肥存礼让,岁岁春光好游赏.”见张咏著,张其凡整理:《张乖崖集》,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8 页.
- [41] 陈元靓:《岁时广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二二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0 页.
- [42] 费著:《岁华纪丽谱》,《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5 页.
- [43] 韩琦《安阳集校笺》,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巴蜀书社 2000 年版,第 1559 页.
- [44] 韩琦《安阳集校笺》,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巴蜀书社 2000 年版,第 1573 页.
- [45] 赵抃有诗《九河张公二月二日始游江以集观者韩公绛因创乐俗亭为驻车登舟之所》:“长桥东畔尼朱轮,画栋雕栏锦水滨.子美浮槎传大句,乖崖游棹看芳春.樽壘泛泛留佳客,鼓吹喧喧乐远人.夹岸香风十余里,晚随和气入城闉.”此处九河张公即张咏.见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 6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77 页.
- [46] 田况《二月二日游江会宝历寺》:“昔年张复之,来乘寇乱馀.三春虽宴赏,四野忧艰虞.遂移踏青会,登舟恣游娱.戒备渐解弛,人情悉安舒.垂兹五十年,材哲不敢逾.愚来再更朔,遽及仲春初.彩舵列城隈,画船满江隅,轻桡下奔瀨,从輿临精庐.因思贤守事,所作民乃孚.”见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79 页.
- [47]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 5 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510 页.
- [48] 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08 页.
- [49] 田况《浣花亭记》,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837 页.
- [50] 任正一《游浣花记》,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881 页.
- [51] 何耕《龙华大像盖冀国夫人所作因成二绝》,见《全宋诗》第 43 册,第 26846 页.
- [52] 任正一《游浣花记》,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881 页.
- [53] 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1 页.
- [54] 赵抃《成都古今集记》,见王文才:《蜀志类钞》,巴蜀书社 2010 年版,第 195 页.
- [55] 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1 页.
- [56] 田况《四月十九日泛浣花溪》,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81 页.
- [57] 宋祁《春日出浣花溪》,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4 页.
- [58] 范镇《和成都吴仲庶见寄来韵》,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 6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56 页.
- [59] 吕陶:《净德集》,《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57 页.
- [60] 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5 页.
- [61] 京镗《念奴娇》,见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3 册,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2382 页.
- [62] 宋祁《忆浣花泛舟》,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5 页.
- [63] 苏洵《浣花溪》,见《全宋诗》第 54 册,第 33955 页.
- [64] 朱友垓撰:《定园睿制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成化五年刊本,卷五.
- [65] 四川省文史研究会:《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5 页.
- [66] 张俞《望岷亭记》,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834 页.
- [67] 李石《转运司爽西楼记》,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52 页.
- [68] 杜甫:《杜诗镜铨》杨伦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20 页.
- [69] 赵抃《成都西楼》,见《全宋诗》第 6 册,第 4177 页.
- [70] 吴中复《西园十咏·西楼》,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26 页.
- [71] 李新《登西楼呈桑彦周》,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 21 册,第 14235 页.
- [72] 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2 页.
- [73] 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7 页.

- [74] 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0 页.
- [75] 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 册,第 142 页.
- [76] 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2 页.
- [77]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2 页.
- [78]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2 页.
- [79] 钟惺著,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3 页.
- [80]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 册,第 215 页.
- [81] 吴中复《流杯亭》,袁说友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28 页.
- [82] 沈立《海棠记序》,见杨慎编,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线装书局 2003 年版,第 1693 页.
- [83] 晏殊《海棠四首》,见《全宋诗》第 3 册,第 1947 页.
- [84] 黄庭坚著,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第 4 册,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1355 页.
- [85] 王可喜、王兆鹏:《吴中复年谱》,中国诗歌研究,2013,第 338 页.
- [86] 吴中复《江左谓海棠为川红》,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 7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708 页.
- [87] 范纯仁《和吴仲庶龙图西园海棠》,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 11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428 页.
- [88]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2057 页.
- [89] 黄升:《花庵词选》,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204 页.
- [90] 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4 页.
- [91]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48 页.
- [92] 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第 1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2 页.
- [93] 刘宰:《漫塘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〇九,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617 页.
- [94] 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 册,第 1697 页.
- [95] 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6 页.
- [96]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49 页.
- [97]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27 页.
- [98]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18 页.
- [99] 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